

單親家庭兒童危險因子

黃秀香

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問題敘述

目前台灣地區六十五歲以下的成年處於離婚分居及喪偶等失婚情形者，計占六・一九％。就其婚姻關係遭遇變故時子女的年齡來觀察，離婚分居者當時多處於生養兒女階段，子女均尚未成年的比率達七二・一八％；喪偶者因多數年紀較大，成年子女相對較多，惟子女均尚未成年者仍有三九・一六％，至目前為止，因最小子女尚未成年仍負有子女教養責任者，離婚分居及喪偶者的比率仍有六一・四一％及二六・八九％（行政院主計處，二〇〇〇）。因此離婚分居且最小子女尚未成年仍負有子女教養責任者較喪偶者為多，其

成為單親家庭後的經濟狀況、身心困擾、子女教養、角色負荷、家庭重組、社會關係及相關法律等問題是為單親家庭的問題，進而成為社會問題，為使其得到適當的生活標準，社會支持及福利服務對單親家庭的影響是本文探討的主要目的。

一般而言，單親家長因有未成年子女的教養責任及經濟負擔和單親家長本身的情緒適應而導致的健康問題、社會關係等的調適，有可能出現其家庭的危機——親職失能及生活適應（Lasko, 2002）。親職失能即是單親家長成為單親後，家庭結構的損傷，亦即家長情緒的適應影響其身心健康問題，而產生對子女教養態度的疏忽，造成子女內外行為偏差，影響家庭生活的適應。但新家庭的價值觀告訴我們：單親發生後，不一定會造成子女的不良影響，如單親後親子關係良好，是可彌補單親後家庭經濟變差及其他生活間所造成的負面作用，所以，不要刻意將單親家庭「標籤化」和有負面印象。綜合上述，當家庭結構發生變化時，尤其在成為單親家庭半年

內，政府或民間相關福利團體如何評估其在此危機期間提供適當的福利服務，使單親家庭免於無助及家庭再次瓦解，為本文主要研究的動機。本文將從文獻實證資料探討中，歸納出單親家庭兒童適應之相關變項，而建立單親家庭兒童危險因子，以提供社會工作者作為評估單親兒童危險因子參考，並進一步了解大直地區單親家庭學童在生活適應中四種危險因子的狀況。

第二節 名詞解釋

一、單親家庭的定義

單親家庭是由父親或母親與其未婚子女所組成的家庭。而單親家庭類型包括未婚、離婚、分居及喪偶、配偶為戶外人口、同居、祖孫家庭、次單親（離婚後與原生父母同住）（薛承泰，二〇〇一）。而本文採以上所述的單親家庭定義來界定單親家庭研究的範圍。

二、危機概念

從語意學上來說，危機一詞源自希臘語，本意是指疾病轉好或轉壞的轉捩點，有「難關」、「轉機」、「主要關鍵」的意思（陳秀靜、吳淑真、林淑茹，二〇〇〇）。依據 Caplan (1964) 所下的定義，所謂危機狀態是指個人面對達成其人生重要目標受阻的情況時，雖運用習慣性的解決問題方法，仍然無法克服所產生的狀態。此時個體會陷入一段混亂和動搖的時期，但個體在不斷地嘗試各種解決方法後，終會發現到一種對個人或是周遭的人都是最好結果的因應方

式。不論是男性單親或是女性單親家庭中的子女，其本身就是較缺乏支持資源的系統，也因此，單親家庭比一般家庭更容易遭受到各種不同的危機（引自劉焜輝，一九九五；陳宇嘉等，二〇〇〇）。

第二節 研究限制

單親兒童的研究有許多困難與限制，為使其缺點減至最低，應採取下列方式進行：

就自變項而言（繆敏志，一九九〇：三二一—三三三），應注意（1）依據心理學或其他有關理論為基礎，來演繹各種研究問題或假設（Price-Boham & Baliswick, 1980; Levinger, 1979）。（2）增加受試的複雜性，至少要考虑單親兒童的性別、年齡、失親年齡、失親時間、單親原因及單親性別等變項。（3）研究變項應儘可能廣泛，至少包括家庭重組歷程及社經地位等干擾變項（Blechman, 1982）。（4）取樣須客觀，應由一般團體中抽取受試，並應避免採用與一般概念不同的操作定義。如長期研究，應考慮如何測量造成單身父母再婚的原因（Blechman, 1982）。

就依變項而言，應注意（1）避免研究者刻板觀念，不僅視單親事件為一危機，亦應視為一轉機（繆敏志，一九九〇：三二一—三三三）。正如王淑俐（一九九九）在「家庭會教人——從家庭的打擊中站起」一書中所說的單親兒童有父以絕不放棄愛的精神使之有安全感、自信心、不怕成長中的挫折失敗。

在依變項的測量尚須考慮所採用的工具，是否能充分反映兒童的行為，抑僅是反映刻板印象。儘量採取自陳法，避免採取教師評定法、家長評量法或法庭的資料來衡量單親兒童的行為表現（Blechman, 1982）。任何依變項的測量均有可能是一種發展遲緩的現象，而不是持續的差異。因此，應進行長期的研究以觀察受試的轉變（Rasmussen, 1987），或者在解釋上，需考慮到此種發展遲緩的現象應隨著時間如何轉變（Blechman, 1982）。

因此本研究的限制，僅能由學校團體中抽出受訪者，採自陳法方式，無法作長期的觀察。基於人力及財力的限制，無法作十歲以下兒童的問卷及大直地區二所國民小學及二所國民中學全部單親兒童的問卷調查，因此，該研究結果只能解釋大直地區十一至十六歲單親兒童的生活適應問題，亦即危險因子僅作為評量十一至十六歲之行為危機參考。

第二章 單親家庭相關理論

單親家庭相關理論中，本文以耗散結構理論，視家庭為一個有機的結構體，因家庭解組後，成為一個耗散結構體，使家庭成為一個不平衡系統；在系統理論中，家庭是一個動態的平衡系統；而因家庭的外部環境的影響，有可能使單親家長因耗散能量，導致情緒適應與身心健康，影響親職能力，又因外界環境能量的增強，而有

磁力能量的產生，造成單親家庭可能成為優勢家庭的趨勢。下列闡述耗散結構理論以說明單親家庭結構的現象。

第一節 耗散結構理論

一、耗散結構定義闡述

普里戈金（Prigogine）的耗散結構理論（Dissipative Structures Theory）是屬於「非平衡系統理論」（Nonequilibrium System Theory）中的一支。耗散結構理論認為任何生物都是一個遠離平衡態的開放系統，都要不斷與周圍環境進行物質和能量的交換，只有新陳代謝才能維持其生命。生命本身是一種耗散結構，如果它一旦由非平衡態變為平衡態，就意味著生命的終止和死亡的來臨。耗散結構理論把耗散性與結構有序性結合起來，把「平衡思維」轉向「非平衡思維」，這無疑是科學上一次思維方式的變革（顏澤賢，一九九三：四五至五八）。普里戈金認為耗散結構是當一個開放系統達到遠離平衡態的非線性區時，一旦系統的某個參量的變化達到一定的閾值，通過漲落（fluctuation），系統可能發生突變，即非平衡相變（nonequilibrium phase transition），由原來的、無序的混亂狀態轉變到一種時間、空間或功能有序的新狀態，這種有序狀態需要不斷地與外界交換物質和能量才能維持，並保持一定的穩定性，不因外界的微小攪動而消失。耗散結構系統能自行產生的組織性和相干性，被稱作自組織現象（self-organization）。所以耗散結構理論又稱為非

平衡系統的自組織理論(顏澤賢,一九九三:四五—四六)。Prigogine 對耗散結構理論的定義從開放系統、遠離平衡態、漲落、非線性等四方面來說明：

首先，從開放系統來看，Prigogine 在談論「開放系統」時，引進熱力學「熵」(entropy)的概念，他認為對於一個遠離平衡的開放系統，其總熵的變化由兩個部分組成，一部分是系統本身由於不可逆過程引起的熵增加，這一項永遠是正的；另一部分是系統與外界物質和能量引起的熵流(entropy flow)，這一項可正可負可為零。在孤立系統中沒有熵流，只有在開放系統熵流才會存在(顏澤賢，一九九三；沈力譯，一九九〇)。Prigogine 認為「熵」不僅向著無組織性滑去，在某些條件下「熵」本身會成為有序的根源。如經歷婚姻危機(婚暴、外遇)的婦女，有些當事人身負著社會傳統對女性的規範束縛「好女人應該要容忍、要包容！」等，這些聲音讓當事人面對婚姻危機事件時，一方面承受丈夫背叛與傷害的痛苦，而另一方面又必須承擔好像自己做得不夠好、不懂得忍讓與包容的罪惡感與壓力。這樣的心情耗竭當事人的能量，就好比是「熵」的增加，而這股熵增加所產生的現象，促使當事人開始思考「婚姻的意義」、「傳統女性規範與束縛的意義」。當事人在自覺過程中，也開始了不一樣的人生觀。另外，在家庭互動中常看到類似的狀況，許多父母因子女進入青春期的現狀，如拒學與親子衝突等，也使彼此重新調整原有的互動關係，調整使原有的關係產生了新的變化與動力。

再就遠離平衡態方面來看，Prigogine 將系統狀態分為(1)平衡態即是熵的增加，系統趨於無序。(2)線性非平衡態($dS=0$)，系統即使開始有一些有序結構，但最後抵抗不了系統內部熵產生的破壞，而使系統趨於無序，不可能出現任何新的結構和組織。(3)遠離平衡態($dS<0$)系統不斷在環境中獲取物質和能量，這些物質和能量給系統帶來了負熵(negentropy—可用的能量)，且當熵流 $dS_{\text{total}}=dS_{\text{int}}+dS_{\text{ext}}>0$ 時，系統總熵的變化總滴變化可小於零，即只要存在負熵流，系統就必是朝著減熵方向發展，即朝著降低無序、增加有序的方向發展。

又就漲落方面來看，開放系統和非平衡性主要是指形成有序結構的外部條件。但系統演化真正達到質變，還需要其內部條件。同時，外部條件要通過內部條件才能發揮作用。耗散結構理論指出，產生有序結構的內部誘因就是漲落。在一個系統內，當諸要素間不存在絕對的獨立、均勻、對稱關係時，它們之間的差異即由此產生的相互干擾，必然導致對於宏觀結構原有穩定性的一定偏離。這種系統中某個變量的行為對穩定性的偏離就叫漲落，它具有觸發器作用。在遠離平衡的非線性區時，系統處於一種不穩定狀態，任何隨機的小漲落可能被迅速放大，形成宏觀整體上的「巨漲落」，使系統由不穩定狀態躍遷到一個新的穩定的有序狀態，從而形成耗散結構。如：堆很高的土窯，我們無法預知當一粒土塊掉落的時候，有可能什麼動靜也沒有，有可能只是引起幾塊土粒掉落，也有可能小

小的撞擊正好引起適當的連鎖反應，導致土塞全面大崩潰。

又就非線性方面來看，開放性、非平衡、漲落乃是形成耗散結構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漲落是隨機的，它隨時都在產生，究竟那漲落能驅使系統達到新的穩定有序狀態，這是漲落本身所無法回答的問題，還需要求助於它的更深刻內在依據，這就是非線性相互作用，如非獨立的相干性、有時空中的非均勻性、多體間的非對稱性等。Prigogine 指出，只有在系統保持遠離平衡和在系統的不同元素之間存在著非線性機制的條件下，耗散結構才能出現。任何系統的存在和發展根本原因，都必然來自系統內部要素相互維繫的力量，這種力量就是系統的非線性作用力。非線性作為演化的內在動力和機制，可分為兩方面：一為非線性是系統本身所固有的不斷協調各子系統的一種內在機制；另一為非線性是系統與外界環境相互協調，促使系統演化的主要依據。耗散結構之所以強調系統的開放性，是因為開放性刻劃著系統與環境的相互作用，這種相互作用同樣具有非線性的一切特徵。

二、耗散結構理論之應用

文獻中，了解貧窮動態的經驗研究成果有三項：（1）改變了以往橫斷性研究及理論（尤其是貧窮文化理論），對於貧窮人口的認知，以為窮人是個穩定的群體，長時間的停留在貧窮的地位中。這些貧窮動態經驗研究（Bane & Ellwood, 1986, O'Neill et al., 1987; Blank, 1989; Bane & Ellwood, 1994）指出窮人並非是同質的團體，且多數屬於短期貧窮者。（2）短期貧窮家戶的特徵與長期貧窮家戶在

特徵差異不大（Duncan et al., 1984），但持續貧窮者以女性戶長普遍化有關（Bianchi, 1999；薛承泰，二〇〇二）。（3）從相關研究中（Bane & Ellwood, 1986; O'Neill et al., 1987; Blank, 1989; Bane & Ellwood, 1994）我們發現婦女（女性單親家庭）脫貧機率受家中小孩數、薪資率、教育程度等的影響。小孩數愈多愈不易脫離貧窮，而薪資率與教育程度愈高愈快脫離貧窮。這些經驗研究者重在對某一項假說的檢證或僅描述經驗資料、修正貧窮持續的測量、修正分析方法、及對資料使用的檢討等層面，雖對理論的建構有所幫助，但還不夠充分。因此，呂朝賢等（二〇〇〇）提出現存的貧窮理論——貧窮文化、情境觀點、Mead、Murray 與 Wilson 等五個理論／觀點，對貧民的行為與家庭結構的注重。而理論的發展莫不與其當下的社會環境有關。不過在這些理論中一個共通的限制就是無法對貧窮動態現象給予良好的解釋，對家庭資源的解釋強調努力市場的薪資所得，忽略家庭其他成員的貢獻及家庭不同所得來源的解釋。因此，貧窮理論的發展應回歸到貧窮問題的最基礎層面：家庭，以解析貧窮成因與動態過程。所謂貧窮動態，如解釋對象是個人或家庭可分為三種流動型態：（1）致貧，由非貧至初入貧窮狀態；（2）持續貧窮，由第一年或第 n 年持續至第 $n+1$ 年貧窮；（3）脫貧，由貧窮至非貧（呂朝賢、王德睦，二〇〇〇：一五一）。有關致貧部分，Duncan 等人（1984）分析美國持續貧窮時間，發現介於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貧窮人口，在這十年當中某一年為貧窮，但在下一年即脫離貧窮；從脫離貧窮的機率分析，落入貧窮達到三年之後，就不

容易脫離貧窮 (Bane & Ellwood, 1986)；有關影響脫貧部分，Hutchins (1981) 使用「所得動態的追蹤研究」(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 PSID)，研究發現，進入福利時的所得有很大的影響 (Hutchins, 1981；王仕圖、王德睦、蔡勇美，二〇〇一)。以下以耗散結構理論的「熵」概念來思維貧窮家庭兒童內在需求及生活事件的想法：

就貧窮者渴望友誼和愛來看，可能許多人不會相信，貧窮人最深的渴望是獲得我們的友誼和愛，因為大多數的人總以為物質的匱乏，才導致貧窮的真正原因。在許多的場合中，我們十分強調經濟的救助、社會安全體系的建立等。我們只要將「物質匱乏」原因加以克制，貧窮問題便可以迎刃而解。當我們要想進入彼此的生命裡時，在貧窮人當中，尤其尖銳。他們是封閉、敏感、多疑、善變且充滿著敵意。(林麗雲等，一九九四：七)。若試著以克勞修斯 (Clausius) 的「熵」的概念——改變的能 (作功後形成不可回收的廢能) 來解釋貧窮原因，則貧窮家庭的封閉現象，就如家庭系統的能量無熵的流動而成孤立系統 (總熵 = 內熵 + 外熵，此為開放系統。內熵總是不小於零，故恆為正值。外熵有三種情況：外熵 = 0——孤立系統；外熵 > 0——則總熵大增，速向死亡；外熵 < 0——系統獲得解放。如：熱機內部有高熱所產生的內熵，熱機外部則由冷卻系統及排吸氣系統所導致的外熵，而內外整個系統的能變，就稱為總熵)。若貧窮家庭能與外界環境互動 (若環境負面少)，且對家庭系統輸入「負熵」(環境處於低溫狀態，對系統輸入負熵，則系統的總熵有三種可能：負熵 < 內熵，表示能延緩衰老期。負熵 = 內熵，則系統的總熵為零，表

示臨界狀態。負熵 > 內熵，則總熵值 < 0，表示將另有一生機正醞釀形成) 則其總熵值 < 0，表示家庭系統內的能量大，要脫離貧窮的可能性大增。

在就貧童的重要生活事件而言，以田野調查法研究來自低收入戶家庭的八—十二歲兒童共十六位，以貧童自己拍攝他們自覺重要的事情，再利用照片進行面談，運用持續性比較分析法分析，歸納出三個主題：「關光照顧感」(給予與分享)、「被幫助」(發生困難時有人提供幫助)、「快樂感」(自己感覺快樂時)(張淑敏、宋惠娟，二〇〇〇：二二三)。下列就給予、分享、被幫助及快樂感等四方面來說明低收入戶兒童自覺的重要事件：

在給予 (feeling cared for giving) 方面而言，給予行為最常出現於兒童與父母親之間的關係。當兒童談及給予行為是生活中的重要事件時，兒童會描述被關心與照顧的感覺。在分享 (feeling cared for sharing) 方面而言，分享發生於兒童與兒童朋友、親戚、家人、寵物和玩偶之間的關係。兒童朋友常是同年齡同學或年齡相仿的玩伴，他們彼此分享生活，包括時間、玩具、金錢和遊戲等。在被幫助 (being helped) 方面而言，被幫助發生於別人幫助兒童解決困難時。其中以同學是最常被提到幫忙他們解決困難者。在功課上，兒童的媽媽、哥哥或老師常是幫忙兒童解決問題的人。在快樂感 (feeling of happiness) 方面，快樂感出現於兒童感覺快樂的時候或某些事情讓他們快樂的。兒童舉出能讓他們生活覺得快樂的事情如欣賞花、美好的事情 (校園的狗)、好笑的照片 (靈異照片) 或娃娃 (會動的)。

由上述得知，貧窮兒童最需要的是被關愛與友伴互動，及生活環境的美好事物的刺激。亦即把兒童當一個獨立的子系統來看，而兒童（視為開放性系統）對家庭中其他子系統及家庭外系統的互動愈多，所獲得的同儕人際關係及家人關係機會則越多。而獲得外界的資訊也越多，對其成長的阻力或助力則視其外界力量的「熵」是「正熵」或「負熵」了。

第二章 影響單親兒童相關理論研究

在經濟自由、市場開放及趨向服務業的社會，現代婦女就業比例提高，使得婦女在經濟方面較以前獨立，且加上女性主義的抬頭及其他原因導致台灣的離婚率逐漸升高，相對的單親兒童的人數由一九九一年的四〇九、六七五人至一九九九年增為四五五、九六二人，也就是單親兒童人口數由五·六四％提升為七·三一％（廣義的單親，包括未婚、離婚、分居、喪偶、配偶為戶外人口、同居、祖孫家庭、次單親等）（薛承泰，二〇〇二：一四）。單親兒童人口數的提升，這意味著缺乏愛、歸屬感及生活照顧的兒童在學校生活中有孤獨、冷漠、自卑、不熱衷參與活動、同儕團體間的人際關係不良及學業不佳等的現象增多，甚而有部分兒童則出現竊盜、蓄意

破壞、逃學或失蹤、仇視別人、或以暴力解決等的問題。但並非所有的單親家庭都是問題家庭，或單親家庭的兒童都是問題的兒童，這要視其單親家長對子女的管教方式及單親兒童對自己的自我概念、情緒管理及人際互動的困擾度而定。以下就影響單親兒童發展的理論如社會階層化理論、家庭壓力理論及單親家庭成員適應理論討論單親兒童適應問題。

第一節 社會階層化理論

社會階層化是指一個社會中，根據個人的學歷、權力、財富、聲望等因素的差異而形成高低不同的社經地位狀態。雖社會階層化主要理論不只一項，但因衝突論強調社會階層化會限制人類的效率，甚至抑制個人的發展，如阻礙教育機會均等的可能性，這適足以說明低社經地位對兒童的不利影響。因此，以下將概括敘述此理論，並運用至單親兒童上：

一、社會階層化理論基礎

衝突論學派，認為社會之所以有平等現象，是以擁有權勢者為維持其現有地位而故意安排，以阻擋外人輕易的加入。且才幹非社會地位分級的主要因素，有些是受家庭的影響，而有較佳的健康、生活與教育，所以當與他人爭奪高職位時，自然有較優先的條件，因此權力及環境背景是決定個人社會地位的主要因素（蔡文輝，一九七九）。

社會階層化是角色分化與價值評定兩者聯合作用的產物。在實際研究中常以社會經濟地位 (social economic status, SES) 為社會階層化的操作定義 (林生傳, 一九八二)。文獻中, 家庭社經地位會以物質條件、家庭內部結構、家庭歷程及家庭文化等四方面向來影響其子女的行為表現 (王玉屏, 一九八一)。

從物質條件而言, 低社經家庭囿於經濟條件限制, 物質方面不僅無法滿足基本需要, 也不符合社會團體的標準, 而造成居住環境、健康狀況及學習環境等不良的問題。如居住環境條件的限制, 低收入家庭的住宅及家庭設備落於一般水準之下, 故影響其身心發展 (Douglas, 1964): 健康狀況方面, 因居住環境不佳, 衛生習慣缺乏及一般病痛不予就醫等諸多因素, 致令低收入家庭成員的健康情形較差, 兒童先天生理缺陷亦較多; 在學習環境方面, 低收入家庭子女不僅沒有良好的學習場所及充分的學用品, 甚至無力負擔教育經費, 常因需幫助家計, 而影響其就學或升學的機會 (王玉屏, 一九八一)。

次就家庭內部結構而言, 在家庭社經地位低落, 可能導致家庭大小和家庭結構的完整性亦隨之改變。家庭大小方面, 低社經家庭子女數較多, 生活較易困窘, 且親子互動亦相對減少 (Douglas, 1964): 在家庭結構的完整性方面, 低社經家庭的婚姻關係較不協調, 經常有遺棄、離婚、分居或私生等情形出現 (Moore, 1979; Rawling, 1984; Rodgers, 1987; Rothstein, 1988; Sander, 1985)。同時低社經家長職業等級較低, 所從事工作較具危險性, 因而死亡率較高, 會產生

較多的單親或破碎家庭 (劉淑娜, 一九八四)。

再從家庭歷程而言, 一般家庭歷程意指家庭組成分子間的交互作用, 它包括親子關係及父母教育態度等。親子關係方面, 低社經家庭的親子關係偏向放任或權威式, 後者較前者更為普遍, 而此種親子關係又會造成子女的種種適應問題 (Munsinger, 1975)。父母教育態度方面, 低社經家庭所秉持之教育態度, 易趨向於消極或極端的現象, 此種教育態度亦會影響子女的發展與成就 (陳克業, 一九七四)。

最後就家庭文化而言, 家庭文化意指由家庭結構歷程所傳遞的家庭觀念、態度、語言及行為等。低社經家庭所聚居之處, 由於物質剝奪及社會隔絕, 而形成一種無規範 (anomie) 的次級文化, 即 Parham (1968) 所謂的貧窮文化 (the culture of poverty), 而貧窮文化將會對人格特質及語言運用產生若干影響; 在人格特質方面, 因低社經家庭長期生活在社會和經濟的壓抑下, 對自我評價較低, 工作動機較弱, 對未來較不抱期待, 自覺受人厭棄, 並傾向於將成敗原因歸於命運 (王玉屏, 一九八一)。在語言運用方面, 因社經家庭缺乏有組織的活動、家庭人數較多、親子關係疏遠等因素, 因而常用大眾語言類型, 乃限制子女的社會化發展及閱讀學習 (Bernstein, 1961)。

二、社會階層化理論之應用

由於低社經家庭在物質條件、家庭內部結構、家庭歷程及家庭文化上均處於不利的地位, 因而影響其子女的行為表現。亦因家庭

結構的不完整，導致單親兒童的適應問題，此可能在單親前社經地位低落所造成的，而不是家庭結構是否完整所造成的（鄭麗珍，二〇〇一；吳殷齊，二〇〇〇；陳圭如，一九九六）。McLanahan (1985) 亦提出經濟剝奪假設也是由社會階層化理論所演繹得來的。所謂經濟剝奪假設認為，單親兒童的適應問題係因單親後家庭收入銳減所造成的，如排除最近家庭收入的影響後，單親與完整家庭兒童的行為表現，則無甚差異。McLanahan 還表示，經濟剝奪假設除牽涉到最近家庭收入外，尚涉及單親就業及福利救濟等問題。就單親就業而言，即認為低收入迫使單身家長外出工作，而無法充分監督孩子，故導致子女在校行為問題。就福利救濟而言，即認為單親家庭多接受福利救濟，因接受福利救濟需承受福利依賴與福利壓力的影響，而造成單親兒童的適應問題。

再就單親事件會造成家庭收入減少的假設而言，Flynn (1984) 及 USCCR (1983) 均認為，因單親家庭只有一位家長賺錢，或因原來的總收入要支持兩個家庭，而有捉襟見肘之感。美國一九九二年統計單親家庭中，幾乎有一半左右的家庭所得低於「貧窮線」的收入標準 (Annual Statistical Abstracts, 1993)。有九成為女性單親，在分居或離婚後至少有減少三成的收入 (Bumpass & Rindfuss, 1979; Burden, 1980)。相對地，男性單親只有八%的生活在貧窮線以下 (Pearce, 1990)。Rice (1983) 實證研究發現，美國有六〇%的單親母親必須依賴社會福利的補助或其家人的幫助；單親父親雖不像單親母親那樣困難，但收入亦不及有配偶之男性。而我國徐良熙及林

忠正（一九八四）研究發現，不論女性或男性家長，單親家庭的收入均不如核心家庭或複式家庭；許惠瑾（一九八四）研究亦發現，雙親內聚及分裂家庭兒童的社經地位高於單親內聚家庭兒童。可見單親會造成家庭收入減少，在家庭收入不足下，其物質條件、家庭內部結構、家庭歷程及家庭文化上處於不利的狀態，則可能會造成單親兒童的適應問題。

再就單親就業會導致子女適應問題的假設而言，有些學者認為，低收入會迫使單親外出工作，無法充分照顧孩子，乃造成單親兒童的適應問題 (Coletta, 1979; Hetherington et al., 1978a)。此一假設易與缺少重要認同楷模假設及家庭壓力假設相混淆，並與經濟剝奪假設相違背，且單親就業是否會減少對子女的照顧亦值得懷疑（繆敏志，一九九〇）。由與家庭壓力假設關係來看，單親就業涉及角色及地位的轉變，而角色及地位的轉變亦是家庭壓力理論所重視的，故易與家庭壓力假設相混淆。從其與經濟剝奪假設的關係來看，Smith (1979) 研究指出，女性單親若為就業，則有五十一%屬於貧窮，若有兼差工作則有十九%屬於貧窮，若有全時制工作，則僅有七%屬於貧窮。因此單親就業會導致子女適應問題的假設，易於經濟剝奪相矛盾。再從單親就業是否會造成子女缺乏監督來看，Rowland & Nickols (1985) 研究發現，單親母親和已婚母親相較，在時間運用上雖有所不同，但對孩子的照顧則無甚差別。因單親就業是否會造成子女適應問題上有爭議。

就接受福利救濟會造成接受者適應問題假設而言，Anleita

(1981) 與 McLanahan 觀點相同，惟研究者並未將經濟剝奪假設重點放在此：接受福利救濟至少讓單身家長與子女共同生活在一起，亦具有正向功能 (Florence & Janssens, 1977)；且是否接受福利救濟與家庭收入高低呈負相關 (Weiss, 1984)。故可以家庭收入為代表；我國福利救濟措施不普遍，僅有少數的單親家庭接受補助。尤其女性單親家庭陷入貧窮風險較高，再加以對福利訊息認知不足，對接受福利的看法多呈負面，這些都影響單親家庭福利的使用 (鄭惠修，一九九九)。

最後就單親性別會影響家庭收入的假設而言，女性是經濟上的弱者，在教育程度低於男性，即使同樣的教育程度，大學畢業女性與一般僅受過八年教育程度的男性相當 (Hewlett, 1986; Smith & Ward, 1984)，而我國女性的薪資為男性的六分之一。同時在離婚後，只有少數的離婚父親繼續支付子女補助費，即使有支付，亦不足子女實際開銷的一半 (Flynn, 1984)。因此，單親事件發生後，女性單親受經濟剝奪的可能性將超過男性單親。綜合相關文獻後，Arendell (1987) 指出，離婚後是女性的社經地位會陡降，而不是男性。單親事件發生後，多由女性取得子女監護權，使得美國大部分的窮人為婦女及其未成年的子女，而造成貧窮女性化 (feminization of poverty) 趨勢 (Bradley, 1987)。而台灣學者亦研究發現，約有半數的離婚婦女覺得離婚後有經濟困難，需要幫助 (呂寶靜，一九七九)；寡婦有四二%淪為貧窮戶 (劉淑娜，一九八四)。可見，女性單親受經濟剝奪的可能性超過男性單親，而其監護子女亦被經濟剝奪，可

能造成一母單親兒童適應問題較多。

第二節 家庭壓力理論

家庭壓力理論係源自壓力與危機理論，早期的家庭壓力理論以 ABCX 模式 (Hill, 1949, 1958, ABCX model) 最為著稱，而後陸續有學者致力修改此模式，其中最負盛名者首推雙層 ABCX 模式 (McCubbin & Patterson, 1981, Double ABCX model)。以下將概括深論此二種模式，並將其運用至單親兒童上，最後再對理論的應用加以評析。

一、家庭壓力理論之基礎

(一) ABCX 模式

早期家庭壓力理論以 Hill (1949, 1958) 的 ABCX 模式最為著名。他認為面對一個壓力來源或壓力情境時 (A 因素)，家庭用來適應壓力的資源 (B 因素) 與家庭對該壓力情境所下的定義或認知 (C 因素)，會影響個人是否產生良好的適應 (X 因素) (藍采風，一九八七)。換言之，那些經歷危機事件次數較頻繁，影響程度較深，且成員較傾向定義事件為「危機」的家庭，容易經歷實際的危機，這類家庭即其所謂的危機傾向家庭。

(二) 雙層 ABCX 模式

雙層 ABCX 模式係 McCubbin 及 Patterson (1982, 1983a, 1983b) 所提出的。此模式同時考慮危機前與危機後的相關因素。其多出四

個概念有：(1) 累積的需求 (a 因素)：此指在危機前與危機後一段時間內所累積的需求（壓力來源）。(2) 家庭適應的資源 (b 因素)：資源指現有的或因要應付危機而加強、擴張、尋覓的資源。包括個人資源：家庭成員的特質，如自尊、知識、技能等能用來面對危機的一些特質；家庭系統資源：如家庭的凝聚力、適應能力、溝通模式等；社會支持：家庭成員與家庭系統之外，哪些能協助家庭度過難關或面對困境的一些朋友或社會網絡。(3) 認知的一致性 (c 因素)：係指家庭對危機情境所下之定義，它不僅指家庭對內在與外在環境的觀點，且強調家庭成員間的動力。(4) 家庭適應 (x 因素)：係指家庭在面對壓力過程所產生的後果。

早期對家庭壓力的研究，多偏向家庭對非尋常事件 (non-normative event) 的反應及家庭發展史中的常規轉變 (normative transitions) 對家庭成員的影響 (McCubbin et al., 1981)，並強調這些事件的發生會影響個人身心健康。但晚進學者認為壓力是代表著轉機或資源，如個人一味的躲避壓力，則會喪失一些改善自己生活的大好時機 (藍采風，一九八七)，且處在高壓狀況下，不是所有的人都會產生心理疾病 (Kobasa, 1979)。因此，除了解生活壓力可能會影響行為表現外，更要了解那些因素有助於減少或緩和壓力事件對個人的影響，而能以適當的方式去解決或面對它。所以近來研究家庭壓力的主題探討：一為強調個人及家庭的心理資源 (psychological resources) 與知覺的重要性；二為強調所有社會資源 (social resources) 與因應 (coping) 的重要性 (McCubbin et al., 1980)。

二、家庭壓力理論之應用

綜上所述，單親事件屬非尋常事件，是重大的家庭壓力。單親事件是子女重要的壓力來源，常涉及到多元角色及地位的轉變，導致憤怒及失落的感受 (Hetherington et al., 1978a; Wallerstein & Kelly, 1980)。美國科羅拉多州立大學對兒童壓力排行榜調查結果，兒童以失去父母為最高的壓力 (引自繆敏志，一九九〇：五四)。所以，失去父母是兒童所面臨的最大危機事件，可能會導致兒童種種的適應問題。McLanahan (1985) 提出的家庭壓力假設，是由家庭壓力理論所演繹出來的。他認為，失親時間愈久，兒童的適應狀況會逐漸轉好，並表示不同單親原因 (包括離婚、分居、鰥寡及私生) 具有不同的影響力，其中應以分居的負面影響最大，私生最小。上述家庭壓力理論除可解釋上述等變項之外，尚可解釋兒童性別及單親性別等變項，並隱含著應注意中介變項的影響。

首先就兒童性別而言，男性的生理在面對壓力及危險時比女性更脆弱 (Rutter, 1970, 1982)；且因男童獲得的社會支持亦較女童為少 (Hunter & Younis, 1982; Kriegler & Bogat, 1985)；另男童常有易怒的氣質 (Eme, 1979)。所以，單親男童的適應狀況將比單親女童差。Hetherington (1979) 也認為男童不但比女童有較多的壓力、挫折及攻擊，且其來自單身家長、教師及同儕的社會支持亦較少。Wallerstein 和 Kelly (1980) 認為女童的心理比男童較具彈性。以上學者的看法與家庭壓力理論所演繹的假設相似。

再就失親時間而言，個人或家庭適應的歷程包含三部分 (Hill,

1949, 1958)。(1) 解組：當生活事件改變而對家庭的需求程度超過家庭所能負荷時，便造成個人或家庭的混亂、迷惑及無助。(2) 恢復：解組後，則試著以緊急因應方式來克服危機。如失敗，則危機所產生的緊張將導致更沮喪。(3) 重組：此種重組可能與危機前的功能相同、更好或更差。所以，除非在適應時，緊張程度增高而一直無法克服，一般而言，失親時間與單親兒童表現呈正相關。即失親愈長則負面影響愈小。Wallerstein 和 Kelly (1980) 認為，孩童對父母離婚的經驗，經歷初始階段 (initial stage)、過渡階段 (transition stage)、重整階段 (restabilized stage)，隨時間過去，孩子由最初的震驚、憤怒、及排拒反應，漸開始適應新生活，至五年後左右，則已能適應單親家庭的生活方式。而 Kubler-Ross 則表示，兒童面對父母死亡將經歷震驚階段、憤怒階段、憂傷階段、接受階段等四階段的不同反應，由最初的震驚，轉變為憤怒、憂鬱，最後終能接受事實。

又就單親原因而言，發現鰥寡係屬失去成員危機，而分居、離婚及父母一方自殺則屬違反道德並失去成員危機。後者必須承受違反道德及失去成員的雙重壓力，所以，因分居、離婚而產生的單親家庭，將較鰥寡（自殺除外）而產生的單親家庭經歷更大的危機。再由危機經歷所經過的階段來看單親家庭的原因，可發現分居係處於解組階段，而離婚及鰥寡有可能已至恢復或重組階段，雖在恢復或重組階段，個體亦有趨向的可能，而在解組階段，卻必然會造成混亂。所以，分居家庭應較離婚、鰥寡家庭面臨更大的壓力。綜合上述，分居、離婚、鰥寡三種單親家庭中，以分居家庭的壓力最大，

離婚次之，鰥寡再次之。因此，單親兒童的適應問題亦應以分居家庭兒童最多，離婚家庭兒童次之，鰥寡家庭兒童再次之。Kison 及 Raschke (1981) 認為因分居既非已婚有非合法的結束婚姻關係，地位曖昧不明，因此比離婚更易感到苦惱。Kison 及 Raschke 的看法與家庭壓力理論對離婚與分居的假設近似。

又就單親性別而言，男性生理較女性更為脆弱 (Rutter, 1970, 1982)，又因婚姻對男性較具保護作用，至少在心理疾病方面，已婚男性比對女性較為有利。但單身對男性比對女性略為不利 (Gove, 1972)。另因成年男性比成年女性有較少的支持關係 (Leavy, 1983)，且在面對急遽壓力時，男性較會否認依賴的需求，拒絕他人的支援 (Price-Bonham & Balewick, 1980)。因此，男性單親的適應狀況應比女性單親差，而單親的適應狀況亦會影響其子女的行為表現。依此推論，依父單親兒童的適應狀況比依母單親兒童差。

在就中介變項的影響而言，最近之家庭壓力研究強調心理資源與知覺、社會資源與因應等二類中介變項的重要性，這意味著當兒童面臨急遽壓力時，此類變項會影響其行為表現。在心理資源與知覺中介變項，有些學者認為，當兒童面臨危機時，兒童氣質是影響其適應良窳的關鍵 (Keogh & Pullis, 1980; Rutter, 1983; Thoms & Chess, 1977; werner & Smith, 1982)，其中 Thoms 和 Chess (1977) 表示，難養一易養類別氣質是最重要的變項。換言之，單親事件雖為兒童的重大危機，但對易養型兒童的損害可能較小，對難養型兒童損害則可能較大。就社會資源與因應中介變項而言，有些學者認為，當兒

童處於壓力的環境下時，社會支持具有減少或緩衝的效果（Hetherington, 1979; Rutter, 1983; Rutter et al., 1979; Sandler, 1980）。換言之，單親事件雖是兒童的家庭壓力，但若有良好的社會支持的話，單親兒童的行為表現也不見得會趨劣。

第二節 單親家庭生活適應理論

適應（adaptation）一詞原是 Darwin 於一八五九年提出進化論時最先使用的名詞，Darwin 認為生物為了生存，適度的改變自己，以期與客觀的環境配合，謂之「適應」。Fairchild（1977）在社會學辭典中對適應定義為：「適應是一種過程，用以改變個人的行為，如透過順應與文化環境建立一種和諧而有效的關係」。而洪秀珍（二〇〇〇：四〇）綜合國內外學者對適應一詞的觀點，認為「適應乃是一種過程，在此過程中，個體為了與外在環境保持和諧與平衡，必須藉著同化和調適等的順應方式，以期能與外在世界加諸於個人身上的要求維持均衡的關係」。也就是說，個體是值耗散結構體時，為取得平衡狀態，必得獲取外界環境資源來平衡，此種過程，得需藉助適應方式，以達均衡。

單親家庭成員適應理論是 Ihinger-Tallman（1986）依據 Hill 的 ABCX 模式及綜合有關文獻後所建立的，可用來解釋單親家庭成員適應（包括單身家長及其子女）優劣原因。依據 Ihinger-Tallman（1986）的單親成員適應理論表示，單親家庭影響成員適應的最主要變項有

三：其中兩項屬於家庭內的因素，包括家長（家庭）經濟資源及家庭成員的心理特質；第三項為家庭外的因素，係為社會支持。以將概括敘述此一理論，再將其運用至單親兒童上，並對理論及其運用加以評析。

一、單親家庭成員適應理論之基礎

依據 Ihinger-Tallman 的單親家庭成員適應理論表示，單親家庭影響成員適應主要變項有三：包括家長（家庭）經濟資源及家庭成員的心理特質（家庭內因素）與社會支持（家庭外因素）。這三項因素直接影響單親家庭成員的適應之外，還會透過家庭重組歷程，間接影響成員的適應。其中經濟資源能直接影響心理特質與社會支持，並透過社會支持與心理特質二者間接影響家庭重組歷程及成員適應，且由心理特質（或社會支持）與家庭重組歷程在間接影響成員適應。惟 Ihinger-Tallman 指出，上述的關係是交互的，多元的，而非等加的。以下針對該理論所牽涉到的變項加以介紹。

首先就經濟資源而言，Ihinger-Tallman 所謂的經濟資源，係包括家長教育程度及收入等變項。他認為經濟資源是影響家庭重組及適應的最重要變項。如有穩定且可靠的收入，則能確保經濟獨立，並能預測家庭功能的有力變項。雖經濟資源屬於家庭內的因素，惟社會亦可提供良好的就業及就學的機會，因此，社會在增進家庭經濟穩定性中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次就心理特質而言，Ihinger-Tallman 所謂的心理特質，係包括價值與態度（如：有關權力及控制）、需求的知覺、生活改變的知覺、

轉變事件的定義(如：對鰥寡、離婚、未婚私生或單身領養的定義)，與人格特徵(如：彈性、適應性及社會性等)。他認為這些心理變項會影響家庭成員對重要轉變事件的因應方式。

再就社會支持而言，Ininger-Tallman 所謂的社會支持，係指社區藉著托兒、訊息傳播及教育或治療計畫等形式的社會支持。前者的服務係為非正式的社會支持，後者的服務則為正式的社會支持。至於非正式支持的來源包括鄰居、親戚、朋友及熟人等。

最後就家庭重組歷程而言，Ininger-Tallman 所謂的家庭重組歷程，係指親子關係(包括親子溝通、對孩子責任的期望及家庭常規的穩定性)、監護抉擇(即非監護家長與孩子的接觸)、家長衝突即界線、家庭次級系統界線。他認為家庭重組歷程係為一中介變項，它不僅受到心理特質、經濟資源及社會支持的影響，亦能影響家庭成員的適應。

二、單親家庭成員理論之應用與評析

綜上所述，Ininger-Tallman 的單親家庭成員適應理論，不僅可用來解釋單身家長的適應狀況，亦可運用來解釋單親兒童的適應狀況。若將此理論運用在單親兒童身上，尚有幾項問題值得探討的。以下針對經濟資源、心理特質、社會支持、家庭重組歷程及各變項間的關係等問題，分別述諸如下：

(一) 經濟資源

從社會階層化理論所演繹的經濟剝奪假設認為，單親事件會造成家庭收入減少，而收入不足則會使得兒童在物質條件、家庭內部

結構、家庭歷程及家庭文化上處於不利的地位，而造成種種適應問題。社經地位低落或家庭收入減少是造成單親兒童表現不佳的重要因素(Alers, 1982; Bigle & Kaufman, 1983; Blechman, 1982; Herzog & Sudia, 1973; Roddy, 1984; Shinn, 1978)。由此可見，單親事件會造成家庭經濟資源不足，且家庭經濟資源亦是影響單親兒童適應的關鍵因素。

雖家庭經濟資源是影響單親兒童適應的關鍵因素，但繆敏志(一九九〇)基於三項理由認為，Ininger-Tallman 所謂的經濟資源應限於家庭收入方面較妥，而不涉及家長教育程度。(1)發生單親事件後，雖可能會因為兒童所依附的對象係屬雙親中教育程度較低者，而造成社經地位低落；惟就單親家長本身的教育程度而言，大多數發生單親事件前的教育程度，並未隨之變動。(2)即使單親兒童所依附的對象係屬於雙親中教育程度較高者，亦可能會因只有一位家長賺錢，或因原來的總收入要支持兩個家庭，而有捉襟見肘之感。(3)如經濟資源包括家長教育程度，則易與由社會階層化理論所演繹的無影響假設相混淆。

(二) 心理特質

根據有關家庭壓力理論發現，心理資源與覺知是應付家庭危機的重要中介變項，其中以兒童的氣質為影響其適應良窳的關鍵。許多學者(Hehnerington, 1979, 1989; Kurdek, 1981; Rutter, 1979, 1987)認為易養型氣質的兒童比難養型氣質的兒童面對父母離婚時，較少有負面的反應。而 Ininger-Tallman 的人格特徵(彈性、適應性及社會

性等)亦多是氣質所包含的向度。所以,氣質是決定單親兒童的重要心理特質,尤其以難養一易養類別氣質為其關鍵。

難養一易養類別氣質不僅是決定單親兒童適應的關鍵,也可能會因單親事件的發生而對其有所影響。由認同理論的觀點來看,單親兒童缺乏適當的認同,將會妨礙其難養一易養類別氣質。由家庭壓力理論的觀點來看,危機的經歷,可能使個體解組,亦可能恢復原狀或更趨健康,故意會對單親兒童難養一易養類別氣質有所影響,為其可能趨劣,亦可能恢復或轉好。因有關單親兒童氣質方面的研究相當罕見,此類研究係以氣質為自變項而非依變項,故目前缺乏實證研究可支持或推翻單親事件會對兒童的難養一易養類別氣質有所影響的假設。

(二) 社會支持

根據有關家庭壓力理論的發現,社會支持與因應是應付家庭危機的重要中介變項,其中以兒童的社會支持為影響其適應良窳的關鍵。許多學者(Bigle & Kaufman, 1983; Hetherington, 1989; Roy & Fuqua, 1983)認為兒童的社會支持是決定單親兒童適應的重要變項。所以,兒童的社會支持的確是決定單親兒童適應的關鍵。

兒童的社會支持不僅是決定單親兒童適應的關鍵變項,且亦可能會因單親事件的發生而對其有所影響。由認同理論的觀點來看,單親兒童缺乏適當的認同,會妨礙其社會支持。由家庭壓力理論來看,經歷過家庭解組的危機後,單親兒童的社會支持有趨劣、恢復或轉好三種可能。在社會未能完全接受單親兒童,單親兒童將內化

此種負面的形象,而形成心理孤立(Jauch, 1977)。此看法與家庭壓力理論所演繹的社會支持趨劣的假設近似。從文獻實證結果來看(Love-Clark, 1984),發現教師對單親兒童的支持,的確不如其對完整家庭兒童的支持。且離婚家庭兒童比完整家庭兒童的社會支持較少(Wyman, Cowen, Hightower & Pedro-Carroll, 1985)。離婚家庭青少年的朋友比完整家庭青少年社會支持少(Hodges & Lennan, 1986)。我國研究發現單親兒童的人際關係不如完整家庭兒童(劉永元,一九八八)。這些實證研究結果,則能支持單親事件會對子女的社會支持有所影響的假設,惟其均為負面的影響,未有恢復或轉好的傾向。

社會支持包括互動的內容、互動的主體及互動的歷程來說明社會支持。從互動內容來看,可視為提供訊息、資源或協助;從互動的主體來看,可視為可適用即可信賴的他人、團體或組織;從互動的歷程來看,可視其為人際關係的交流或互動(邱瓊惠,一九八八)。因此社會支持可視為:個體透過團體的互動,使其成員提供各種協助,尤其在壓力的情境時,能滿足其需求或增進其適應能力(繆敏志,一九九〇)。

洪冬桂(一九八六)綜合有關文獻,將社會支持的功能分為兩個層面,一為偏重「健全」(wellness)的意義,另一為偏重「病態」的意義。前者就是認為社會支持是強化個人的生活精力,增進個人應對環境的能力;後者認為社會支持主要在挽救危機的個體,使其在生活壓力下能防禦傷害。Gladow 和 Ray (1986)也綜合有關文獻,將社會支持的來源分為正式與非正式兩種,前者係

由諮商員或社工人員所提供的專業性協助關係；後者係由親戚、鄰居或朋友所提供的非專業協助關係。邱瓊惠（一九八八）及 Thoits（1986）綜合過去文獻，將社會支持分為工具性（instrumental）、情緒性（emotional）、及訊息（informational）三類。工具性的社會支持係指，提供物品、金錢、勞力、時間或任何直接的協助（House, 1981）；情緒性的社會支持係指，提供同理心、照顧、愛、信任、自尊、關心及傾聽（Cobb, 1976; House, 1981）；訊息的社會支持係指，提供勸告、建議、指導及有助於因應個人及環境間的訊息（House, 1981）。

社會支持雖可按其功能、來源或方式來分類，惟應將其區分清楚。Ininger-Tallman 將社會支持分為正式與非正式二者，按其來源分類，其內容（托兒、訊息傳播及教育或治療計畫等）牽涉到支持的方式，實有混淆不清之弊端。且正式與非正式的社會支持均包含工具性、情緒性及訊息等三種方式的支持，並非只有非正式的支持才能提供托兒或訊息傳播等服務，因此，Ininger-Tallman 所調的社會支持，應按其來源分為正式與非正式二種，而每種又應包含工具性、情緒性及訊息等三種方式的支持。

（四）家庭重組歷程

家庭重組歷程可視為社會支持的一環。依據家庭壓力理論的假設，家庭重組歷程亦是影響單親兒童適應良窳的關鍵。一些學者（Emery, 1982; Hess & Camara, 1979）亦表示，家庭歷程才是兒童適應的關鍵所在，而不是單親一完整家庭。在家庭重組歷程的變項中，

親子關係之良窳是決定兒童適應優劣之關鍵（Allers, 1982; Hess & Camara, 1979; Khoe, 1986; Kurdek, 1981; Rasmussen, 1987; Rosenthal, 1979; Wallerstein & Kelly, 1980）。所以，家庭重組歷程是影響單親兒童適應的重要變項，其中以親子關係為最。

由認同理論觀點來看，單親兒童由於缺乏適當的認同，將會妨礙其親子關係的發展。從微觀而言，父親式工具性角色的代表，母親式情感性角色的化身（Parsons, 1958; Parsons & Bales, 1955），固有嚴父慈母的型態出現。在嚴父慈母家庭則能兼顧關懷與權威兩種層面的親子關係，但單親家庭只有父或母，故未能兼顧二者。如男單親則較擅長權威親子關係，拙於關懷親子關係；反之，女單親則擅長於關懷親子關係，拙於權威親子關係。實證研究發現，離婚家庭母親比完整家庭母親，在處罰及控制上的教養方式較有困難（Coletta, 1979; Heherington, 1989）。此種研究結果與認同理論所演繹的假設相似。

由家庭壓力理論的觀點來看，危機的經歷，可使個體解組，亦可能復原或更趨健康，故單親兒童的親子關係有可能趨劣、恢復或轉好。許多研究者所持看法與家庭壓力理論所演繹的親子關係趨劣的假設相似。有些學者認為單親家長自身的情緒困擾及對單親角色的曖昧不明，將使親子關係惡化（Heherington, 1976; McDermott, 1968; Wallerstein & Kelly, 1976）。而在夫妻婚姻不和諧時，家長角色的執行經常與子女的期望不符，造成子女對其個人表現的負向回饋，促使家長產生角色緊張（許惠瑾，一九八四）。另有一些研究與家庭壓

力理論所演繹的親子關係恢復或好轉的假設相似——有部分家長表示，自離婚後親子關係較離婚前已獲改善(Hetherington, 1978a, 1978b, 1979; Skeen & Mckenry, 1980)。

親子關係的定義，一般係視為親子所建立彼此間穩定的感受，子女對父母的行為及父母對子女的行為均透過此交互作用而加以修正(Good, 1973)。而親子關係的類型大體分為單層面、雙層面及多層面三種劃分方式(楊自強，一九八五)。依據國內外綜合有關文獻，親子關係大致可由兩向度予以涵蓋，「關懷(或愛護)——拒絕(或敵視)」與「權威(或要求)——自由(或寬容)」(朱瑞玲，一九八四；簡茂發，一九七八；Maccoby & Martin, 1983)。

親子關係應分為關懷與權威兩個層面，繆敏志(一九九〇)認為Ininger-Tallman將親子關係視為親子溝通、對孩子責任的期望及家庭常規的穩定性，是不妥的，應依據綜合國內外文獻，親子關係可以兩個向度——關懷與權威來探討。事實上，親子溝通較偏向關懷層面的親子關係，對孩子責任的期望及家庭常規的穩定性則偏向權威層面的親子關係。

(五) 各變項間的關係

依據Ininger-Tallman單親家庭成員適應理論中各變項間的關係，依其自變項的不同可分為經濟資源、心理特質、社會支持及家庭重組歷程等四項。惟因各變項對單親兒童適應的影響在前已述，不再贅言。另家庭收入、兒童的難養一易養類別氣質、社會支持及親子關係，分別為影響單親兒童適應中最重要的經濟資源、心理特

質、社會支持及家庭重組歷程等變項，故以下就經濟資源、心理特質、社會支持及家庭重組歷程等四個變項彼此間的關係來敘述。

就家庭收入而言，Ininger-Tallman理論推知，單親家庭的收入會影響兒童的難養一易養類別氣質、社會支持及親子關係。由家庭收入與兒童難養一易養類別氣質間來看，社會階層化理論所演繹的經濟剝奪假設，由於單親家庭的收入銳減，造成單親兒童在物質條件、家庭內部結構、家庭歷程及家庭文化處於不利地位，因此，單親兒童的難養一易養類別氣質將有趨劣的可能。雖目前尚缺乏有關家庭收入對單親兒童氣質影響的研究，依據Sameroff & Kelly(引自陳玉華，一九八一)研究發現，不同社經背景兒童的氣質確實有些不同。所以，家庭收入減少應會對單親兒童的難養一易養類別氣質有所影響。

由家庭收入與兒童的社會支持間來看，社會階層化理論所演繹的經濟剝奪假設可知，單親家庭的收入銳減，將會造成兒童社會支持不佳。單親家庭的經濟狀況日益低落，經常搬家，將造成社會網絡的不穩定。所以，單親家庭收入銳減將會對子女的社會支持不利。

由家庭收入與親子關係間來看，社會階層所演繹的經濟剝奪假設可知，單親家庭收入銳減，將造成親子關係不良。Goode(1956)研究指出，缺父家庭的經濟壓力會影響非經濟關係，尤其是母子關係。Krisberg(1970)亦指出，女單親家庭由於收入銳減，搬到較廉價且較不安全的地區，為顧及子女安全且為維護家中的資產，乃

採用較為限制的教養方式。Colella (1979) 亦研究發現，低收入的離婚母親較常採用限制及要求的教養方式。所以，單親家庭的收入不足，將會造成親子關係趨劣，且較可能會產生高度要求及控制的親子關係。

就兒童的社會支持而言，依據 Ihinger-Tallman 理論推知，單親兒童的社會支持會影響親子關係。單身家長的社會孤立經驗，使其親子關係緊密結合，而造成單身家長與其子女雙方均不能獨立適應 (Beal, 1980)。依此推理，單親兒童的社會孤立亦可能造成親子關係的緊密結合。親子關係原本就是社會支持的一環，故單親家庭親子關係的良窳自會影響到兒童的社會支持。

綜合上述，家庭收入會影響單親兒童的難養一易養類型氣質、社會支持及親子關係。親子關係是社會支持的一環，而單親兒童的氣質與親子關係間具交互作用，所以單親兒童的氣質與社會支持間亦可能有交互作用；此外，單親兒童的氣質、社會支持與親子關係會影響其適應狀況，甚至單親兒童的適應狀況還會反過來影響其難養一易養類別氣質、社會支持與親子關係。Hess 和 Camara (1979) 研究指出，在經歷過單親事件的急遽壓力後，單親兒童不僅在家庭有不良行為，在社會環境中亦有。故不受他人歡迎而形成孤立。此種看法表示單親兒童的適應狀況亦會影響其社會支持。且單親兒童本身的適應狀況也會影響其親子關係 (Wallerstein & Kelly, 1980) 及其難養一易養類別氣質 (Thomas & Chess, 1977, 1980)。

第四節 危機相關變項

從文獻中瞭解造成台灣地區單親家庭的原因已由喪偶轉變為離婚。而單親家庭要面對家庭結構的改變，會有經濟、子女教養、身心調適等的衝擊，則需要社會福利體系的支持與協助。至於男性或女性單親都會有失落的經驗導致其悲傷無助的感受，而影響其對子女的照顧品質。理論上，男性單親及女性單親在未成為單親前的危機指標上應有所差異，但已成為單親家長時，其單親家庭大小項目危機指標是有其程度上的差異性。因此，上述危機指標可作為評估單親家庭是否應由社工員積極介入，其因應的策略除加強親職教育方案的執行、積極建立社會網絡的支持、訂定單親家庭相關政策法令的法源依據、推動單親家長職業復健諮商政策外，尚需有福利服務的配套措施，以解決單親家庭發生危機時，適時地給予扶助。在建議方面，本文還需再進一步檢測上述單親家庭危機指標的適用性及可行性，應經由資深社工員依其專業工作經驗評估其信度、效度後，再次修訂其各項細目。

綜合上述文獻初探，歸納出單親家長及單親兒童兩方面的危機指標。在單親家長方面，從經濟、健康、情緒、支持性等四面向指標；單親兒童方面，以親子關係、學校生活、家庭生活、情緒及行為、支持性等五面向指標提出單親家庭危機指標供社會工作者評估家庭危機時的參考 (陳宇嘉、黃秀香等，110000)：

一、單親家長方面

(一) 經濟指標：(1) 無固定的收入。(2) 無固定資產孳息、或利息收入等。(3) 無贈與財產的收入。(4) 無不定期的收入。(5) 無負債需償還。(6) 同居人有固定收入。(7) 子女需要教育費。

(二) 健康指標：(1) 有不良嗜好。(2) 有無法根治的疾病。

(3) 身體衰弱。(4) 有精神官能症的疾病。(5) 無法自理生活。

(三) 情緒指標：(1) 憂鬱症。(2) 睡眠時須服鎮定劑。(3) 經常表現憤怒、恐懼、憂傷等失落感受。(4) 經常表現懷疑或不信任人。(5) 眼神呆滯。(6) 人際關係不良、不參與社交活動。(7) 經常自責、無自信。(8) 有虐待行為傾向、無親職能力。

(四) 支持性指標：(1) 原生家庭成員的支持度。(2) 親友、鄰里的支持與鼓勵。(3) 子女的接納與支持度。(4) 工作場所同仁的尊重與支持。(5) 社會福利機構的接納與申請的方便性。

二、單親子女方面

(一) 親子關係指標：(1) 親子間的信任度。(2) 友誼性交往情形。(3) 情感交流狀況。(4) 親子互動頻率。

(二) 學校生活指標：(1) 課業在標準下。(2) 同儕人際關係不良。(3) 經常曠課或遲到早退。(4) 師生關係不良。(5) 經常破壞公物。(6) 經常說謊、偷竊、打架、逃學。(7) 參加幫派影響校園安全。

(三) 家庭生活指標：(1) 經常晚歸、無正常作息時間。(2) 與家人相處困難。(3) 經常打電動不作功課並與不良朋友往來。(4) 經常向父或母索錢花用。(5) 常以武力解決問題。(6) 有不良嗜

好如濫用藥物、詐騙。

(四) 情緒及行為指標：(1) 易怒、懶散。(2) 注意力不集中。(3) 好打架、不合群。(4) 生性殘忍、喜歡虐待小動物。(5) 孤獨、冷漠。(6) 憂鬱、不安全感。(7) 厭食或暴食。(8) 發展遲緩。(9) 性關係複雜。(10) 被標籤化。

(五) 支持性指標：(1) 父母之同居人有固定收入。(2) 有父母之同居人的照顧。(3) 自我接納。(4) 有同儕、老師、親人、鄰居的協助。(5) 有機構的支持。(6) 有財物的支持。(7) 有正式資源支持。(8) 有非正式資源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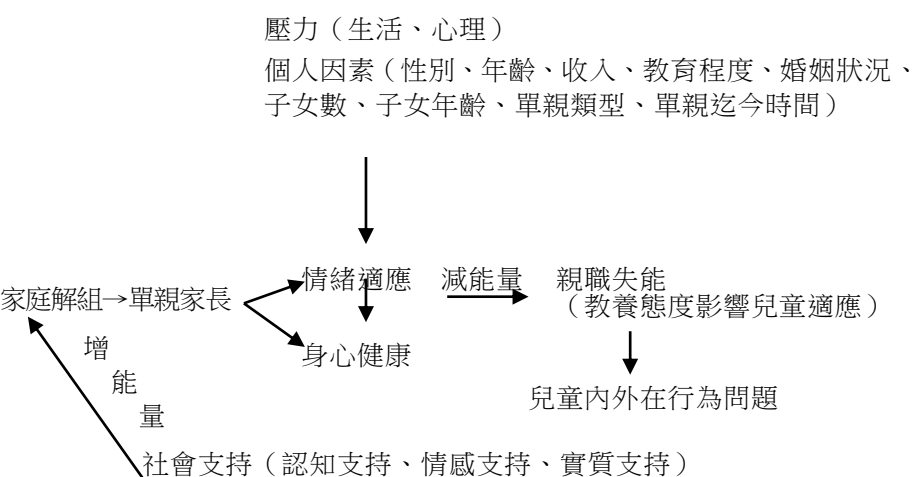
第四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與假設

一、研究架構

(一) 概念架構

從上述單親家庭相關實證文獻中，發現家庭結構的改變影響單親家長的情緒適應及身心健康，而間接地影響單親家長的親職能力，進而影響孩童的生活適應（家庭生活及學校生活）及人格發展（自我概念、情緒困擾、行為偏差）。但社會支持（情感支持如資源網絡、認知支持如資訊提供、實質支持如扶助津貼）可解除單親家



圖一 磁力概念形成過程

以下是研究者由相關實證研究中提出的概念圖：由圖一中，了解自變項與依變項間的關係，形成磁力的概念（能量）與假設：單親家庭的磁力（能量）越強，則單親家長使用社會支持系統愈多；而其親子關係互動越好，兒童行為越趨於正向的表現。

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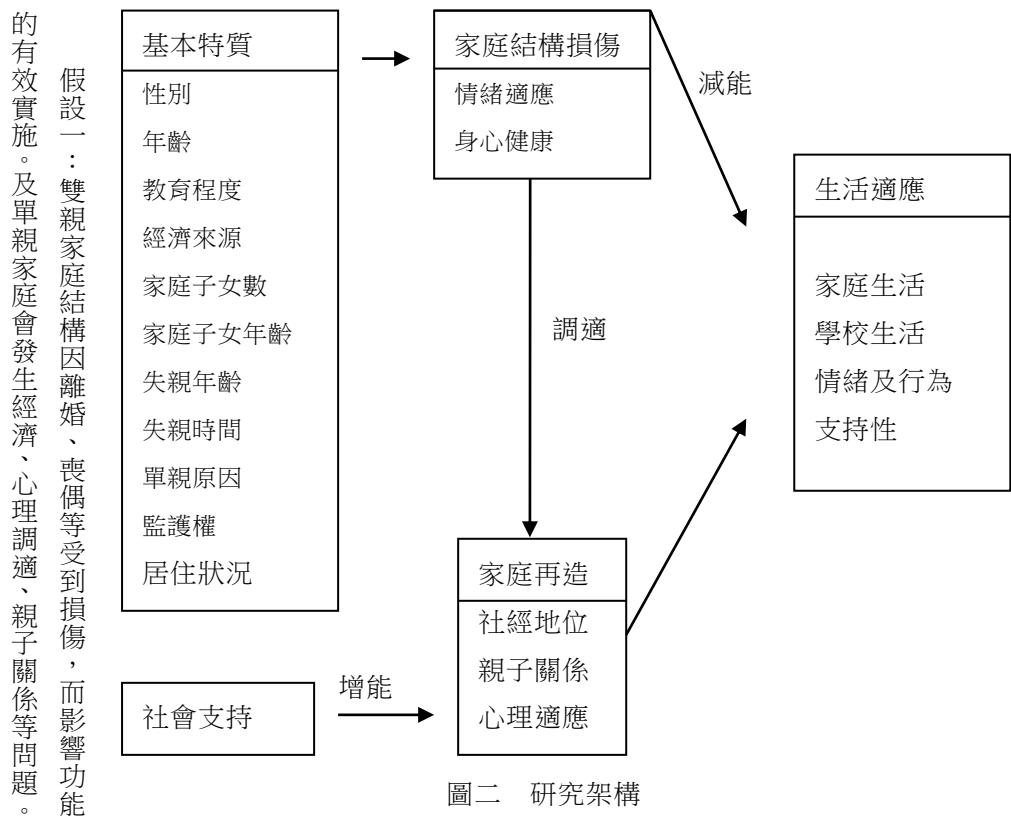
（二）研究架構

本研究認為兒童內外行為的問題，受到家庭結構變動的間接影響，當家庭遭遇到離婚、分居、喪偶、非婚生子等因素形成單親家庭時，即造成家庭解構，而影響單親家長的情緒適應及身心健康問題，使單親家長在親職能力減弱，也就是單親間親子關係及社會關係的改變，形成了單親家庭兒童內在因素及外在因素的危機。研究指出，強化單親家長的情緒適應、健康及親職能力，最有效的方式是社會支持網絡的健全。根據文獻瞭解，影響單親子女之四種理論探討發現，社會階層化理論重視家庭社經地位對子女的影響，不論無影響假設與經濟剝奪假設，社會階層化有重於社經地位之探究。在家庭壓力理論指出家庭的凝聚力、適應能力、溝通模式、社會支持、失親時間是重要影響單親子女適應因素。單親成員適應理論則認為家長（家庭）經濟資源、家庭成員的心理特質及社會支持會影響家庭成員適應，此三項因素交互作用直接或間接影響單親家庭成員的適應。由於單親家庭在時間、精力、經濟、家庭結構上均不同於雙親家庭。因此，基於上述文獻分析，本研究選擇社經地位、親子關係管教態度、社會支持為自變項，探討對兒童生活的危機：包括家庭生活、學校生活、情緒及行為、支持性等的影響。當單親事件發生造成單親家庭形成，此時需要家庭生活的調適，即單親家庭需要內在的再建構及外在的社會支持來協助其功能的恢復。而家庭的再建構會影響

響家庭功能的實施，進而影響兒童的家庭生活、學校生活、情緒及行為適應、支持性功能及親子關係。

二、研究假設

根據文獻探討，雙親家庭可能因單親事件之發生，影響家庭結構改變，使單親家庭面臨經濟困難、心理適應不佳、親子關係失調、社會支持減少等的問題，進而影響兒童的家庭生活、學校生活、情緒及行為、及身心上的支持性。若單親家庭能恢復其社經地位，調適身心健康，重視親子關係，加上充分的社會支持，則可恢復正常家庭功能的執行。據此，本研究形成下列假設：



假設二：家庭功能的恢復需要內部家庭結構的再造及外在的干預。

(一) 社經地位的恢復或維持有助於家庭結構的再造。

(二) 心理、社會調適良好有助於家庭結構的再造。

(三) 親子關係的重建有助於家庭結構的重建。

(四) 有效的社會支持有助於家庭結構的再造。

假設三：單親家庭兒童的家庭生活、學校生活、情緒及行為、及身心的支持性，會受到單親家庭結構損傷的影響。即瞭解缺父或母情況下，對兒童的生活適應發展的影響。

假設四：單親家庭兒童生活適應，會因社經地位、親子關係、心理適應而有不同。

假設五：單親家長情緒適應、身心健康會因家庭子女數、子女年齡、單親原因等因素而有所不同。

第二節 抽樣

本研究的樣本，依年齡層而言，少年的年齡定義是介乎十二歲以上至未滿十八歲者。根據研究統計推估，台北市二〇〇一年單親戶為三七、五八〇戶（聯合報二〇〇二年四月十日報導）但台北市共十二個行政區，從十二行政區抽出一個行政區（中山區），再從中山區抽出大直地區，故抽樣母群體分別為：大直地區五個里（大直里、大佳里、成功里、永安里、劍潭里）。

一、樣本來源

抽樣方式依據戶籍資料抽取樣本，難以判斷該戶是否為真正的單親情況，許多家庭因報稅、財產或小孩就學等種種原因，一家人同居一處卻分屬不同的戶籍。換句話說，許多雙親家庭，在戶籍資料上是單親家庭。所以本研究從處於五個里中的國中、小學學生四、五、六、七、八年級，大佳國小，共有單親學童人數為十四人；大直國小、高年級，共有單親學童人數為七十人；大直國中一二三年級，共有單親學童人數為四十九人；北安國中一二三年級，共有單親學童人數一一二人。研究對象為國中、小學中高年級學生，總共受訪者應有二四五人，基於問卷調查倫理原則，且尊重學童家長之意願，共有一八四人學童參與受訪（九一十六歲兒童及少年）（大佳國小，十四人；大直國小，五十一人；大直國中，六十人；北安國中，五十九人）；回收有效問卷一六六份，回收率為九〇・二二％。

二、統計方法

在預試階段的預試分析進行平均數、標準差、Pearson 積差相關、Cronbach α 內部一致性係數與二階段驗證性因素分析等統計分析，來了解填答情形及研究工具的信度、項目結構、效標關連效度、量表的內部一致性與建構效度等分析，分述如下：

（一）利用平均數和標準差等描述統計

分析「兒童生活適應自陳量表」，包括基本資料、兒童的社會支持部分、家庭結構損傷部分、家庭結構再造部分（社經地位、親子關係、心理適應）、生活適應部分（家庭生活方面、情緒方面、學校

中山區大直地區鄰里戶統計表與兒童及青少年抽樣表

里名	鄰	戶	設置國中、小學
大佳	8	425	大佳國小
大直	36	3622	大直國小
永安	35	3250	永安國小
成功	45	3899	
劍潭	22	1331	大直國中 北安國中

資料來源：台北市中山區戶政事務所

<http://www.cshr.tcg.gov.tw/ZS2002%Chinese/population/zspopulation/91/91-6.htm>

校名 年級	大佳國小	大直國小	大直國中	北安國中
國小中高年級	14	70		
國中一二三年級			60	112
單親總人數	14	70	60	112
抽樣人數	14	51	60	59
發出份數	14	51	60	59
有效樣本	14	51	49	52
總計	發出 184 份，有效樣本 166 份，回收率 90.22%			

資料來源：學校輔導室提供

生活方面、支持性）等預試工具的填答情形與結果。

（二）t 檢定

分析兒童性別不同對「兒童生活適應自陳量表」，包括兒童社會支持部分、家庭結構損傷部分、家庭結構再造部分（社經地位、親子關係、心理適應）、生活適應部分（家庭生活方面、情緒方面、學校生活方面、支持性）等預試工具的填答情形與結果。

（三）卡方檢定

分析兒童年齡、教育程度、監護權、同住狀況、受試學校等不

同對「兒童生活適應自陳量表」，包括兒童的社會支持部分、家庭結構損傷部分、家庭結構再造部分（社經地位、親子關係、心理適應）、生活適應部分（家庭生活方面、情緒方面、學校生活方面、支持性）等預試工具的填答情形與結果。

（四）利用積差相關

了解「兒童生活適應自陳量表」預試卷的項目結構與內部相關，作為篩選題目與建立正式題本的依據；同時也用來考驗上述研究工具與其他相關兒童生活適應研究之量表的效標關連效度。積差相關是表示兩個變數之間的直線關係的量數。

（五）因素分析

以因素分析了解兒童社會支持（學童得到資源支持度）、單親前家庭結構（學童對父母身心健康正負面狀況）、單親後家庭結構（學童對父母的經濟收入、身心健康的正負面狀況）、家庭結構再造之單親前後親子關係（學童在單親前後親子關係狀況）、家庭結構再造單親前後心理適應（學童在單親後心理適應狀況）、學童生活適應（單親後學童在家庭生活、學校生活、情緒穩定性、支持度等可能的存在危險因子狀況）等量表中各因素之解釋量情況。

第二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的研究工具主要為問卷，根據研究目的、理論架構來設計問卷，為資料的可推論性，採結構式的問卷設計，問項均為封閉

型式。問卷設計後，送請資深社工員針對問卷之內容提出書面修正意見，以建立問卷的內容效度。

一、問卷量表內容

問卷主要內容包括個人基本資料、單親成因及家庭狀況、家庭結構再造、生活適應等。

（一）個人基本資料

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主要經濟來源、家庭子女數、家庭子女年齡、失親年齡、失親時間、單親原因、監護權、居住狀況（單親後與誰同住）等共十二題。

（二）單親成因及家庭狀況

有關單親的成因，單親前後家庭生活、經濟狀況，單親後的心理適應、社會支持、學業成就、社會適應等問題，及對目前生活的滿意情形。本研究單親係指喪偶、離婚、分居、未婚生子、配偶為戶外人口、同居、次單親（單親後搬回與原生家庭父母同住）等造成家中僅一位家長，並有十八歲以下子女共同居住之家庭。單親前後家庭生活係受訪學生自述單親前父母相處的情形，家庭氣氛及單親後與父母間的關係。單親前後經濟狀況係指受訪者單親前及單親後家庭經濟狀況與是否於單親後遭遇過經濟困難。單親後的心理適應係指受訪者於單親後是否曾遭遇情緒困擾，而導致身心健康受影響。社會支持係指受訪者於單親後與同學朋友、親戚、服務機構人員來往情形。學業成就指學生在單親後的學業成績、學校適應等問題。

（三）家庭結構再造

家庭再造包括單親前後之家庭社經地位、單親前後之親子關係及單親前後之心理適應。單親前的社經因素對單親兒童目前適應狀況，應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力。排除該因素的影響後，單親兒童的劣勢應可減輕不少，惟有可能不如完整家庭兒童，同時因我國低社經家庭並不一定會發生單親事件，所以，單親兒童仍居於劣勢的可能乃相對提高。單親後的社經因素包括社經地位或實際收入、收入來源等。另因社經地位低落或收入減少，又造成單親家長就業率增加及家庭常搬家等問題。所以，單親家長的就業狀況及家庭搬家的次數亦是重要的單親後的社經因素。有些學者認為，單親家庭由於經濟緊縮，常需搬家到更廉價的地區，而搬家更加重了社會孤立，對孩子而言，搬家不僅會失去原有的朋友、鄰居及家庭教育系統，還會居住在高犯罪率的社區，較少的休閒設施及較差的學校。孩子已經歷過家庭解組，搬家更助長了混亂的情勢。

在家庭結構再造部分，可分為三小部分，一為社經地位，二為親子關係，三為心理適應。社經地位量表，採單親前及單親後的結果比較，共八小子題。預試後經因素分析，採 α 值在.50以上，所以，社經地位題目在單親前共二小子題。

親子關係量表，採單親前及單親後的結果比較共二十四小子題，答以「經常」，給予一分；「有時」，給予二分；「很少」，給予三分；「從不」，給予四分。預試後經因素分析，採 α 值在.50以上，所以，親子關係量表題目在單親前共十六小子題，單親後共十二小子題。

心理適應量表，採單親前及單親後的結果比較，共二十七小子題，答以「從未如此」，給予一分；「很少如此」，給予二分；「經常如此」，給予三分；「一定如此」，給予四分。預試後經因素分析，採 α 值在.50以上，所以，親子關係量表題目在單親前共十八小子題，單親後共八小子題。

（四）生活適應

生活適應包括家庭生活適應：如親子關係間的信任度、互動頻率、情感交流（相處難易）等，生活作息時間，問題解決方式，生活習慣（嗜好）等。在生活適應量表中之家庭生活方面，共十七小子題。答以「非常同意」，給予一分；「同意」，給予二分；「不同意」，給予三分；「非常不同意」，給予四分。預試後經因素分析，採 α 值在.50以上，所以，家庭生活適應題目共十三小子題。

學校生活適應如：課業成績、同儕人際關係、師生關係、學校校規、校園幫派等。在生活適應量表中之學校生活方面，共十三小子題。答以「非常同意」，給予一分；「同意」，給予二分；「不同意」，給予三分；「非常不同意」，給予四分。預試後經因素分析，採 α 值在.50以上，所以，學校生活適應題目共十三小子題。

情緒及行為適應如：注意力集中或分散、合群性或孤獨、快樂或憂鬱、發展良好或遲緩、性關係單純或複雜、行為理性或衝動等。在生活適應量表中之情緒方面，共十二小子題。答以「非常同意」，給予一分；「同意」，給予二分；「不同意」，給予三分；「非常不同意」，給予四分。預試後經因素分析，採 α 值在.50以上，所以，情緒方

面題目共十二小子題。

支持性方面如：經濟與照顧，親友、老師、鄰居協助，機構，正式或非正式支持等。在生活適應量表中之支持性，共八小題，答以「非常同意」，給予一分；「同意」，給予二分；「不同意」，給予三分；「非常不同意」，給予四分。在社會支持部分，以當我碰到困難時，專業人員的態度是如何，由二十二小子題了解之。凡答「一定不會如此」，給予一分；「很少如此」，給予二分；「有時會如此」，給予三分；「經常會如此」，給予四分；「一定會如此」，給予五分。預試後經因素分析，採 α 值在.50以上，所以，支持性方面共八小子題。

二、信度、效度

(一) 問卷信度

本文問卷設計所採的信度，是以「項目間一致性」(inter-item consistency)的考核信度方法，所謂「項目間一致性」是測量工具中問題項目之同質性，是否均在測量同一概念，可由項目間相關係數與項目一總分相關係數來判斷。因此，測量工具經因素分析後，看其Cronba α 值在.50以下來決定刪除依據。所以，在兒童支持量表Cronba α 值為.8680(N=20)；單親前家庭結構情形Cronba α 值為.7500(N=15)；家庭結構再造單親前親子關係Cronba α 值為.8096(N=17)；家庭結構再造單親後親子關係Cronba α 值為.7528(N=11)；家庭結構再造單親前心理適應Cronba α 值為.7709(N=18)；家庭結構再造單親後心理適應Cronba α 值為.7016(N=8)；生活適應部分之家庭生活方面Cronba α 值為.7548

(N=13)；情緒方面Cronba α 值為.9228(N=12)；學校生活方面Cronba α 值為.9211(N=13)；支持性Cronba α 值為.8363(N=8)。

(二) 問卷效度

本文問卷設計所採的效度方法是請從事單親家庭專業社工員共七位(台北市兒童福利聯盟五位，中區、南區世界展望會社工員各一位)參與問卷題目審查的適合度及有效性，因此，如果本研究工具與研究架構概念所測出的家庭結構發生改變時，亦即家庭結構後，形成單親後的單親家長在情緒適應困擾而影響身心健康，進而影響親職能力，導致間接影響單親兒童行為的問題。若透過社會支持力量增強其自身的能力及外在能量的給予，使之大量減低其家庭內的不平衡狀態(家庭結構損傷)，促使其家庭恢復平衡狀態(家庭功能增加)，進而形成家庭結構再造，單親家長在社經地位、親子關係品質及心理的調適都能提高，則本問卷內容的設計效度是可肯定的。

第五章 研究發現與建議

本研究樣本特色為：參與對象平均年齡為十二歲；教育程度平均為六、一七年，即國小六年級及國中一年級間；手足人數平均為一、五九人；與單親父或母生活時年齡為七、五二歲；經濟來源取之於母親為最多；單親原因為父母離婚居多；多數學童與母同住；

居住處多數為自己的住宅。再將資料經由t檢定、卡方檢定及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結果發現分述如下：

一、研究發現

(一) 兒童社會支持部分

從整體兒童社會支持來看，兒童在生活適應中之支持性愈低、單親前之親子關係及生活適應中之支持性愈低，則專業人員對兒童的社會支持度愈高。

(二) 家庭結構情形

1 學童認為父(母)在單親後從未頭痛、憂鬱、或晚歸均有遞減現象。2 單親後滿意自己生活、正當工作收入均有遞增現象。3 單親前父(母)對女童從不用收回喜愛東西為處罰方式較男童為高。4 兒童教育年限愈高，學童在單親前後的家庭結構改變、單親前心理適應及家庭生活能力方面有愈低現象。

(三) 家庭結構再造部分

1 學童在單親前家庭經濟好，但家庭經濟發生困難時會找親戚幫忙為多；在單親前父母對學童交朋友、支配零用金很尊重，單親後也是如此。2 父母在單親前對學童休閒生活很重視；對學童的表現經常很關心在單親後則有遞增現象；單親前後經常親子間像朋友，且彼此很關心對方為最多；單親後經常親子間重視對方感受有遞增現象；而單親後對學童生活習慣很滿意有遞減現象。3 學童在單親前後其情緒沮喪有遞減現象；也從未有生不如死的感覺、從未孤單感覺、從未無法專心讀書情形、從未憂鬱感覺均有遞減現象。4 單親前女童在心理

適應裡會流淚及害怕失去父母的感覺比男童為高。5 整體而言，家庭結構改變後，親子關係愈好、心理適應也愈高。6 學童年齡愈大，學童在單親前的心理適應有愈低傾向。

(四) 生活適應部分

1 危險因子一(家庭生活方面)：學童不同意自己經常晚歸、無正常作息、與家人相處困難等為最多；不會向父母索錢花用；不會交不良朋友、不會以武力解決問題、不會濫用藥物、不會三餐不正常、大人經常在家等為最多。上述結論中，大直地區單親家庭學童在家庭生活正面多，而有家庭生活危險因子學童比率少。2 危險因子二(情緒方面)：(1) 學童不同意自己易生氣、懶散、注意力不集中、好打架、不合群、虐待小動物等不好的行為反應為最多；至於學童的特質自認為情緒穩定、有安全感、不會發展遲緩現象者為最多。(2) 在情緒上女童不同意好打架的情緒較男童為高。上述結論中，大直地區單親家庭學童在情緒方面多數是正面的，而有情緒危險因子學童比率少。3 危險因子三(學校生活方面)：(1) 學童認為自己課業在及格以上、同儕間的人際關係好、不曠課或遲到早退、喜歡老師、不會破壞公物、不逃學、不參加幫派、不被同學歧視、不打架、喜歡寫功課、參加班上大掃除等學校生活現象為最多。(2) 女童在學校喜歡老師的情形高於男童。上述結論中，大直地區單親家庭學童在學校生活正面為多，而學校生活危險因子學童比率少。4 危險因子四(支持性方面)：學童認為自己沒接受機構正式資源、父(母)之同居人有固定收入、父(母)之同居人會照顧自

己、有親人或鄰居的協助、會接納自己、自己手足情深、有老師與同學支持者為最多。上述結論中，大直地區單親家庭學童在正面支持性生活適應為多。

二、建議

(一) 單親家長在家庭生活中多關懷子女的起居作息

年齡愈大學童經常有晚歸及不良朋友交往現象。根據 Judith 在教養迷思一書中指出，不認為兒童早期在家中習得的經驗會影響他們以後的行為型態，表示兒童受同儕影響大。尤其學童年齡愈大對同儕的凝聚力愈大，因而年齡愈小的學童愈不會晚歸，就會有與不良朋友往來機會少的現象。所以，家長要注意子女的生活作息及交友狀況。

(二) 學校老師多對單親學童關懷並對其不良行為之勸導

年齡愈大學童在學校生活中較不喜歡老師，且十三歲學童同意在學校曾經破壞公物，而十一歲及十三歲學童同意有逃學經驗，十四歲學童同意自己曾參加不良組織，在國中階段的情緒會隨年級愈高愈容易發脾氣、懶散、注意力不集中，但年級在國小階段較會虐待小動物。上述現象，老師要能及早發現，則可遏止單親學童的偏差行為，但學童的偏差行為或許是情緒的發洩，或許也是一種引起老師的注意的方法之一，但其偏差行為會引起老師的不悅，造成師生關係的不良，所以，學校老師不要對單親學童有標籤作用，且能適度給予獎懲或同儕團體約束力量以改變其偏差行為。

(本文作者：黃秀香為實踐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曾華源為東

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王仕圖、王德睦、蔡勇美(二〇〇一)。貧窮持續時間的動態分析——以嘉義縣一九九〇—一九九八年低收入戶為例。「全球化與社會福利」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二)。台灣社會福利學會。

王淑俐(一九九九)。家庭會教人——從家庭的打擊中站起。台北市：南宏。

王玉屏(一九八一)。國中低收入學生行為困擾、學習態度與學業成就之調查研究。台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世界辭典百科全書編輯委員會(一九九六)。世界辭典百科全書，十冊，三七二一頁。中視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國百科出版社。

行政院主計處(二〇〇〇)。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台灣地區社會發展趨勢調查報告。行政院主計處。

朱瑞玲(一九八四)。父母教養方式之變遷。教育資料文摘，一五(五)，一二五—一三四。

呂寶靜(一九七九)。台北市離婚婦女離婚後社會調適之研究。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呂朝賢、王德睦(二〇〇〇)。一九六〇s以降的美國貧窮理論：回顧與整合。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一一(一)，一四九—一九五。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沈力(譯)(一九九〇)。混沌中的秩序(Prigogine, I. 原著)。台北：結構群公司。

周俊宏(一九九九)。社會熵值模式的初探。教育社會學通訊，一二，二二—二四。

林生傳(一九七五)。學生學業成就的社會環境因素研究。高雄：析光。

林麗雲等(一九九四)。中國人的貧窮文化。台北市：張老師。

吳齊殷(二〇〇〇)。家庭結構、教養實施與青少年的行為問題。台灣社會學研究，四，五一—九五。

洪冬桂(一九八六)。我國大學生生活適應問題、因應行為、求助偏好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國立師範大學博士論文。

洪秀珍(二〇〇〇)。高雄縣單親婦女社會支持、社會參與與生活適應之關係。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成人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邱瓊慧(一九八八)。社會支持與國中學生的生活壓力與生活適應之相關研究。國立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徐良熙、林忠正(一九八四)。家庭結構與社會變遷：中美單親家庭之比較。中國社會學刊，八，一一—二一。

許惠瑾(一九八四)。家庭內聚型態與兒童自尊、行為困擾、性整腳色之相關研究。文化大學碩士論文。

愛金特(一九九八)。從有序到混沌。新竹市：凡異出版社。

陳克業(一九七四)。國中學生教育與職業抱負及家長期望之研究。

國立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陳玉華(一九八一)。台北市中山區及台北縣泰山鄉三歲至七歲兒童氣質特徵之初步研究。國立台灣大學碩士論文。

陳圭如(一九九六)。單親家庭子女的自我概念、角色行為與教育期望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中山社會科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陳秀靜、吳淑貞、林淑茹(二〇〇〇)。危機調適與任務中心取向之社會工作模式。東海大學研究所碩士班社會工作實務理論課程報告。

陳宇嘉、鄭予靜、錢秀琴、黃秀香、曾竹寧等(二〇〇〇)。單親家庭兒童危機指標之研究成果報告書。中國社會工作教育學會。

陳瑩珊(二〇〇〇)。國小學童依附關係、失落經驗與生活適應之相關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大學教育與心理輔導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妙娟(二〇〇〇)。家庭教育中親子關係與情感認知之研究。教育部台灣省中等學校教師研習會出版。

陳立容(二〇〇一)。「單親兒童服務方案」。台灣單親家庭之現況與政策研討會引言報告，三二。台北市：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陳春秀(二〇〇一)。國小中高年級學童親子溝通、家庭氣氛與親子關係之研究。國立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劉永元(一九八八)。單親兒童與正常家庭兒童人際關係、行為困擾及自我觀念之比較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學院碩士論文。

劉淑娜（一九八四）。寡婦家庭的支持系統與生活適應。台灣大學社會研究所碩士論文。

劉淑娜（一九八七）。單親婦女的支持體系與生活適應之研究。東海大學社會研究所碩士論文。

劉焜輝（一九九五）。危機調適的理論與實施（一）。諮商與輔導，一一〇，二六—三〇。

劉焜輝（一九九五）。危機調適的理論與實施（二）。諮商與輔導，一一一，三九—四一。

劉焜輝（一九九五）。危機調適的理論與實施（三）。諮商與輔導，一二二，三八—四一。

劉美惠（二〇〇〇）。台灣的單親家庭與其貧窮原因之探討。國立台灣大學社會研究所碩士論文。

鄭惠修（一九九九）。台北市女單親家庭社會網絡與福利使用之研究。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鄭麗珍（一九九九）。女性單親家庭的資產累積與世代傳遞過程。台大社會工作學刊，一，一一—一四七。

鄭麗珍（二〇〇一）。家庭結構與青少年的生活適應之研究——以台北市為例。台大社會工作學刊，五，一九七—二七〇。

張淑敏、宋惠娟（二〇〇〇）。貧窮兒童生活重要事件之探討。慈濟技術學院學報，二，二二三—二四四。

蔡文輝（一九七九）。社會學理論。台北市：三民。

簡茂發（一九七八）。父母教養態度與小學兒童生活適應之關係。教

育心理學報，一一，六三一—八六。

顏澤賢（一九九三）。現代系統理論。台北：遠流出版公司。

繆敏志（一九九〇）。單親兒童學業成就、人格適應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論文。

楊自強（一九八五）。國中生價值觀念及父母教養方式關係之研究。國立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薛承泰（二〇〇一）。台灣單親戶及其貧窮之趨勢分析。台灣單親家庭之現況與政策研討會引言報告，三二。台北市：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薛承泰（二〇〇二）。台灣地區單親戶的變遷：一九九〇年與二〇〇〇年普查的比較。台大社會工作學刊，六，一一—三四。

藍采風（一九八七）。健康的家庭生活。南投：台灣省社會福利工作人員研習中心。

藍采風（一九九三）。家庭組織的現代化。中國現代化學術研討會家庭現代化專題論文。

台北市中山區戶政事務所 <http://www.cshr.tcg.gov.tw/ZS2002%Chinese/population/zspopulation/91/91-6.htm>

二、英文部分

Allers, R. D. (1982). Children from single-parent homes. Today's Education, 71 (34), 68-70.

Auleta, K. (1981, November). The underclass. New York, 16.

Bane, M. J., & Ellwood, D. T. (1986). Slipping into and out of poverty:

- The dynamics of spells.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21, 1-23.
- Beal, E. W. (1980). Separation, divorce, and single-parent family. In E. A. Carter & M. McGoldrick (Eds.). *The family life cycle*. New York: Gardner Press.
- Bianchi, S. M. (1999). Feminization and juvenilization of poverty: Trends, relative risk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5, 307-333.
- Bigle, B., & Kaufman, G. (1983). Children of divorce and one-parent families: cross culture perspectives. *Family Relation*, 32 (1), 59-71.
- Blank, R.M. (1989). Analyzing the length of welfare spell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39, 245-273.
- Blechman, E. A. (1982). Are children with one parent at psychological risk? A methodological review.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4 (2), 179-195.
- Bradely, D. N. (1987, December). A common sense approach fighting poverty among single-parent families. *Journal of Employment Counseling*, 166-172.
- Bumpass, L.L., & Rindfuss, R. (1979). Children's experience of marital disrup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5, 49-65.
- Burden, Dianne (1980). Women as single parent: alternative services for a neglected population. In Naomi Gottlieb (ED.), *alternative social services for women*.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Cobb, S. (1976). Social support as a moderator of life-stress. *Psychosomatic Medicine*, 38, 300-314.
- Coletta, N.D. (1979). The impact of divorce: Father absence or poverty?. *Journal of divorce*, 6 (3), 19-13.
- Douglas, J. W. (1964). *The home and the school*. London: MacGibbon & Kee.
- Duncan, G.J., Cox, R.D., & Hill, M.S. (1984). Years of poverty, years of plenty: The changing fortunes of American worker and familie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 Eme, R. F. (1979). Sex differences in childhood psychopathology: A review. *Psychological Bulletin*, 86 (3), 574-595.
- Emery, R. E. (1982). Interparental conflict and the children of divorce, stressful life events, and transitions: A frame work for preventive efforts. In R. H. Price, R. F. Ketter, B. C. Bader, & J. Monahan (Eds.), *Prevention in mental health: research, policy, and practice* (pp.81-108). Beverly Hills: Sage.
- Florene, C. O., & Janssens, M. A. (1977). Family stability in the context of economic deprivation. *Family Coordinator*, 26 (3), 252-258.
- Flynn, T. (1984). Single parenthood. *The Sunday Deaves Post*, 2.
- Gladow, N.W., & Ray, M.P. (1986). The impact of informal support systems on the well being of low income single parents. *Family Relations*, 35 (1), 113-123.

- Good, C.V. (1973). Dictionary of education (3rd ed.). New York: McGraw-Hill.
- Goode, W. (1956). After divorce. Glencoe, IL: Free Press.
- Gove, W. R. (197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x role, marital status, and mental illness. *Social Force*, 51, 34-44.
- Hess, R. D., & Camara, K.A. (1979). Post-divorce family relationship as mediating factor in consequences of divorce for childre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35 (4), 79-96.
- Hetherington, E.M. (1989). Coping with family transitions: winners, losers, and survivors. *child development*, 60 (1), 1-14.
- Hetherington, E.M., Cox (1979) "Play and social interaction in following divorce". *Journal of Social Issue*, 35 (4), 26-40.
- Hetherington, E. M., Cox, R. (1978a). The aftermath of divorce. In J. H. Stevans & M. Mathews (eds.) . *Mother/child, father/child relationships* (pp. 149-176).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ducation of Young Children.
- Hetherington, E. M., Cox, M., & Cox, R. (1978b). Family interaction and the social, emotional and cognitiv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following divorc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ymposium on the family. Washington, DC.
- Herzog, E., & Sudia, C. (1973). Children in fatherless families. In B.M. Caldwell & H.N. Ricciuti (EDS.). *Review of child development research* (vol.3).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ewlett, S. (1986). A lesser life. New York: Harper & Row.
- Hill, R. (1949). Families under stres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Hill, R. (1958). Generic features of family under stress. *Social Casework*, 49, 139-150.
- Hill, R. (1986). Life cycle stages for types of single parent families: Family development theory. *Family Relation*, 35 (1), 19-29.
- Hodges, W.F. (1986). Interventions for children of divorce, custody, access, and psychotherapy. New York: Wiley.
- House, J.S. (1981). Work stress and social support.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 Hunter, F.T., & Youniss, J. (1982). Changes in the function of three relations during adolescence. *Development Psychology*, 18, 806-811.
- Ingiger-Tallman, M. (1986). Member adjustment in single parent families: theory building. *Family Relations*, 35 (1), 215-221.
- Jauch, C. (1977). The one-parent family. *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Psychology*, 6 (2), 30-32.
- Keogh, B. K., & Pullis, M. E. (1980). Temperamental influenc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exceptional children. *Advance in Special Education*, 1, 239-276.
- Khoe, L. (1980). The effects of divorce on children and implication for court custody cases. Doctor of psychology research paper, Biola

- University, CA. (ERIC Document Reproduction Service No. ED237901)
- Khoe, L. (1986) . The effects of divorce on children and implication for court custody cases. Doctor of psychology research paper, Biola University, CA. (ERIC Document Reproduction Service No. ED 273901)
- Klison, G.C., & Raschke, H. J. (1981) . Divorce research: What we know; what we need to know. *Journal of Divorce*, 4 (3) , 1-37.
- Kobasa, S. C. (1979) . Stressful life events, personality, and health: an inquiry into hardnes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7, 1-11.
- Kriegler, J. A., & Bogat, G. A. (1985, August) . A developmental analysis of children's social support network.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Los Angeles, CA.
- Kriesberg, L. (1970) . Mother in poverty : a study of fatherless families. Chicago: Aldine.
- Kurdek, L. (1981) . An intergrative perspective on children's divorce adjustment, *American Psychologist*, 36 (8) , 856-866.
- Laakso, J. H. (2002) . Key determinants of a mother's decision to decision to file for child support. *Families in Society*, 83 (2) , 153-162.
- Leavy, R. L. (1983) . Social support and psychological disorder: a review.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11, 3-21.
- Levinger, G. (1979) . Marital cohesiveness at the brink: the fate of applications for divorce, In G. Levinger & O. C. Moles (Eds.) , *Divorce and separation: content, causes, and consequenced*. New York: Basic Book.
- Love-Clark, P. A. (1984) . Meta-analysis of the effects of divorce on children's adjustment (single parent, parent/child separation) ,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Texas A & M University.
- Maccoby, E.E., & Martin, J. A. (1983) . Socialization in the content of the family: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In P.H. Mussen (ED.) ,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Vol.4)(pp. 1-101).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 McCubbin, H.I., Joy, C. B., Cauble, A. E., Comeau, J. K., Patterson, J. M., & Needle, R. H. (1980) . Family stress and coping: a decade review.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2 (1) , 125-141.
- McCubbin, H. I., & Patterson, J. M. (1983a) . Family stress and adaptation to crises: a double ABCX model of family behavior. In D. H. Olson & B. C. Miller (Eds.) , *Family studies review yearbook* (pp. 87-106) . Beverly Hill, CA: Sage.
- McCubbin, H. I., & Patterson, J. M. (1983b) . The family stress process: The double ABCX model of adjustment and adaptation. In H.I. McCubbin, M.B. Sussman & J.M. Patterson (Eds.) , *Social Stress and the family: Advancess and developments in family stress theory and research* (pp. 7-37) . New York: Haworth Press.

- McCubbin, H. I., Patterson, J. M., & Wilson, L. (1982). Family adaptation. In H.I. McCubbin, A. Cauble & J. Patterson (EDs.), Family stress, coping and social support (pp. 26-47). Springfield, IL: Charles C. Thomas.
- McCubbin, H. I., Patterson, J. M., & Wilson, L. (1981). FLE:family inventory of life events and changes. ST. Paul,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Family Social Science.
- McDermott, J. F. (1970). Divorce and its psychiatric sequelae in children.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23, 421-427.
- McLanahan, S. (1985). Family structure and reproduction of pover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0 (4), 873-901.
- O'Neill, J.A., Bassi, L.J. & Wolf, D.A. (1987). The duration of welfare spells.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69, 241-249.
- Parsons, T. (1958). Social structur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ersonality: Freud's contribution to the integration of psychology and sociology. *Psychiatry*, 21, 321-340.
- Parsons, T., & Bales, R. F. (1955). Family, socialization, and interaction processes, Glencoe, IL: Free Press.
- Price-Bonham, S., & Baleswick, J. O. (1980). The noninstitution: Divorce, desertion, and remarriag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2 (3), 225-237.
- Pearce, D. (1990). Welfare is not for women... why the war on poverty cannot conquer the feminization of poverty. In L. Gordon (ED.) women, the state and welfare.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Rank, M.R. (1988). Racial differences in length of welfare use. *Social-Forces*, 66, 1080-1101.
- Rasmussen, J. C. (1987). The custodial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s mediating factor in the effects of divorce on children. *Bila, CA: Bila University*, (ERIC Document Reproduction Service No. ED 284 146)
- Rice, D. F. (1983). Contemporary marriage. Boston: Allen & Bacon.
- Roddy, P. P. (1984). A close-look at children in single parent familie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ERIC Document Reproduction Service No. ED 254-587)
- Rowland, V. T., & Nickols, S. Y. (1985). How is the time spent? *Journal of Extension*, 23 (1), 13-16.
- Roy, C. M., & Fugua, D. R. (1983). Social support system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of single-parent students. *School Counselor*, 30 (3), 183-192.
- Rutter, M. (1970). Sex differences in children's response to family stress. In E. J. Anthony & C. Konpernick (Eds.), *The child in his family*. New York: Wiley.
- Rutter, M. (1979). Protective factors in children's response to stress and disadvantage. In M. W. Kent & J. E. Roff (Eds.), *Primary prevention of psychopathology: Promoting social competence and coping in*

- children. (Vol. 3) . Hanover, NH: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 Rutter, M. (1982) . Epidemiological-longitudinal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development. In W. A. collins (ED.) , The concept of development: Minnesota symposia on child psychology (Vol. 15) .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 Rutter, M. (1983). Stress, coping and development: Some issues and some questions. In N. Garnezy & M. Rutter (EDs.) , Stress, coping and development in children (pp. 1-42) . New York: McGraw-Hill.
- Rutter, M. (1987) . Psychosocial resilience and protective mechanisms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57, 316-331.
- Sandler, I. N. (1980) . Social support resources, stress, and maladjustment of poor children.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8,41-52.
- Shinn, M. (1978) . Father absence and children's cognitive development. Psychological Bulletin, 35, 295-324.
- Skeen, P., & Mckenry, P. C. (1980) . The teacher's role in facilitating a child's adjustment to divorce. Young Child, 35, 3-11.
- Smith, J.S. (1979) . Alimong for men.. the changing law.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Law Review, 7 (3) , 687-700.
- Smith, J. P., & Ward, M.P. (1984) . Women's wages and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Santa Monia: Rand.
- Thomas, A., & Chess S. (1977) . Temperament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Bruner/ Mazel.
- Thomas, A., & Chess, S. (1980) . The dynamics of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New York: Bruner/Mazel.
- U.S. Commission on Civil Right (1983) . A growing crisis.. disadvantaged women and their children.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 Wallerstein, J. S., & Kelly, J. B. (1980) . Surviving the breakup. New York: Basic Books.
- Weiss, R. S. (1984) . The impact of marital dissolution on income and consumption on single parent household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6 (1) , 115-127.
- Werner, E. E., & Smith, R. S. (1982) . Vulnerable but invincible: a study of resilient children. New York: McGraw Hill.
- Wyman, P. A., Cowen, E. L., Hightower, A. D., & Pedro-Carrol, J. L. (1985) . Perceived competence, self-esteem, and anxiety in latency-aged children of divorce. 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Psychology, 14 (1) , 20-26.